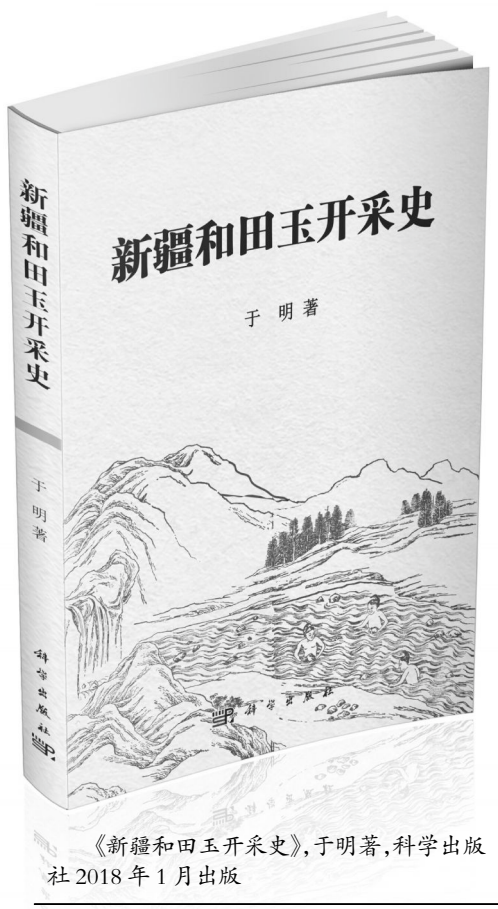




一个人的追问

妇好墓是殷墟宫殿宗庙区内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十几年前，曾经有人对妇好墓出土的玉器来源问题提出过疑惑，结果很快被发掘者堵了回去——不是新疆和田玉，还能是哪里的玉？

如果回到那个年代，半路出身的于明恐怕也只能道歉了事。可是，这样的疑虑在考古界其实一直存在。

在此之前，有必要明确和田玉的概念。它并非新疆和田地区所特有，而是指一类主要由透闪石这种矿物质组成的玉料。世界上许多地区都有和田玉的发现。

随着中国出土大量古玉，很多学者在研究过程中都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些出土古玉的玉料和现在新疆和田玉有些不同，比如河南安阳花园庄东地殷墓、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河南三门峡虢国墓……感觉不同却又说不上来哪不同，当时的考古界就采取了搁置的态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卢兆荫解释，造成这种局面存在现实的阻碍。一般性的仪器检测只能确定玉料是不是透闪石，但仪器无法确定具体的产地。如果要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就必须对玉器进行破坏性取样，然而这种方法在古玉研究中是不被文物管理部门所允许的。于是，所谓的科学依据到了透闪石这一步也就到头了。

不能忽略的一点是，玉料问题确切说是地质学问题，而不属于考古文博的范畴。“按一位地质学前辈的话说，在玉器研究领域，地质学界和考古界完全是两伙人，中间需要翻译。”于明的意思是，这两个学科之间没有交叉，研究者彼此不懂对方的学科语言，因此无法合作探讨玉料问题。

近些年来，研究人员才逐渐开始有所认识，考古学需要地质学的介入，而地质学也需要考古学的知识来把一些自然现象解释得更清楚。

2000 年以后，于明就接受专家的建议，在北京大学学习了半年的地质学专业知

荐书·2018 北京图书订货会

1 月 11 日至 13 日，2018 北京图书订货会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老馆）举办。在这一一度的盛会上，各类新书闪亮登场，更有大量即将出版的好书值得期待。

人民文学出版社将推出茅盾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周大新的最新长篇小说《天黑得很慢》，这是中国首部全面关注老龄社会的长篇小说。

这部书仍旧采用“拟纪实”的手法，用讲故事的方式，关注老龄社会的相关问题。有关爱与恨、病与死等等。小说用冷峻的笔法写出了人在时间无情面前的绝望，同时又用温情的笔法写出了人用以抵御时间的坚韧、温暖和爱。

苏联最后一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最新回忆录《苏联的命运》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披露苏联解体的第一手珍贵历史资料。

这本书包含了戈尔巴乔夫对苏联解体以及俄罗斯命运的深刻思索，全书分三个部分，第一篇“捍卫改革”，揭露“八月事件”的内幕，为新思维、公开化、民主化等改革政策辩护；第二篇“俄罗斯往何处去？”，记录叶利钦执政的上世纪 90 年代，那些重大事件背后的幕后较量；第三篇“令人忧虑的新世界”，探讨恐怖主义、核扩散、生态危机等全球性问题，剖析了普京的领导制度。书中收录了 47 张珍贵历史照片。

后浪出版公司则推出了像《无敌舰队》《我在美军航母上的 8 年》《大历史》《民国了》等社科类书籍，还有《野外鸣虫图鉴》《人类的礼服》《脚鱼》等科普书。

此次全新修订的《民国了》是知名学者杨早的著作，这是一本打破对辛亥革命刻板印象的作品。

《野外鸣虫图鉴》的作者是日本京都造型艺术大学兼职讲师赖长刚，他是日本直翅目昆虫学会会员。这本书以季节和环境为线索，为读者介绍日本自古以来一直作为季节风物诗而为大家所熟悉的直翅目昆虫——蟋蟀与螽斯，展示了这些昆虫的形态特征、发声原理与生活史。

“挑事”新疆和田玉

■本报记者 胡珉琦

最近有档特火的文博节目——百集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每次用 5 分钟的时间讲述一件国宝的前世今生。第十一集出场的主角是“妇好玉凤”，1976 年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妇好墓出土。这件凤形玉佩线条流畅、风韵迷人、侧身回首、转顾生姿，它属于商王武丁的王后妇好。殷墟妇好墓出土多件玉龙，而玉凤仅此一件，可见它的珍贵。

过去，考古文博界普遍认为，妇好墓出土的大部分玉器的玉料来源是新疆和田，质地出众，“妇好玉凤”也不例外。可是，日前出版的一本《新疆和田玉开采史》却完全推翻了这样的认知。从史前到西汉中期以前这一漫长历史时期大量出土的古玉原料根本不在新疆和田。

这一颠覆性的观点对考古文博界而言就像一枚定时炸弹，图书发布会上的消息一经传播，就有妇好墓相关研究人员提出了强烈反对，而身为本书作者的中国玉器专家、新疆和田玉行业协会会长于明的手机几乎每天都被“狂轰滥炸”。

不过，于明再习惯不过这样的情境。过去七八年里，每次他亮出自己的观点，紧跟着就是一场论战。

不管别人在不在意，于明决定去追问那个困扰他的玉料问题。在他看来，玉料来源既是玉器研究的难点，也关乎不能忽视的历史细节。“它是成器年代以及成器所传承的文化解读的依据。”

“籽料无糖”解难题

现如今，于明很有底气地回答，“玉料是可以认识的”。

既然不能直接对古玉鉴定，那就只能用最不省力的办法，一个一个去昆仑山—阿尔金山沿线的玉矿“看原料”，分析它们有什么共性，又有什么个性特征，然后与古玉作对比。

之后的十几年，于明接触了很多新疆的采玉人，他们虽然离学术很远，但他们离一手材料最近，日积月累形成了很多独到的认识。

新疆和田玉分为籽料、山料、山水料和戈壁料四种类型，其中以籽料最为名贵。出土古玉的玉料来源大多是指和田籽料。于明发现，在新疆产区流传着这样一条谚语：籽料无糖。

这个糖色，指的是透闪石的次生色，它是铁元素进入玉料裂隙后形成的红褐色色调。这句谚语的意思，并不是说和田籽料绝对无糖色，而是说有糖色的籽料占比非常小。

于明的实地考察印证了这个说法，他甚至直接表示，自己就没有见到有糖色的和田籽料。

有了这个可用来鉴别的特征，于明还充分利用了自己工作的优势。他坦言，这些年来所有出土玉器的 50%，其中精品玉器的 70%~80%都上手观察了，这是很多人得不到的机会。

由于他带着糖色的眼光来看待古玉，问题很快迎刃而解。他发现，商—汉早期出土玉器大部分都带有糖色，而且是很重的糖色。这些玉器的糖色与和田籽料无糖特征对不上。山料倒是有糖，但整个昆仑山与阿尔金山山料的开发时间很晚，这段时期不可能有山料开采活动。

于明断言，商至汉代中期的出土古玉不是新疆和田玉！起初，故宫博物院玉器部“掌门人”、研究馆员徐琳为此没有少和于明较劲，西周晋侯墓发掘者吉琨璋也多次和于明讨论。

可是，一旦他们开始转变视角，抓住糖色这一关键角度时，发现还没有能够驳斥于明的反例。

此时，他手握的证据不止这些。于明最初是从从事古代文献研究的，挖掘文献是他的强项。他几乎是 从 20 年前起就开始整理与玉文化有关的文献资料，经手过的文献没有 1000 本也至少有 800 多本。这几年，他把其中与玉料有关的文献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他试图去回答一个问题，既然商至汉代中期的出土古玉不是新疆和田玉，那么它们究竟出自哪里？

先秦的许多文献提到“昆仑”地名，许多人认

为这就是特指现在的昆仑山，并由此引出古人所指的昆仑玉就是现在昆仑山出的玉。可于明研究发现，古代昆仑根本就是一个高山统称。他结合文献和进一步的野外调查认为，这一时期的玉料来源应该是在甘肃、青海地区，这是与当时、当地的自然环境、开采条件更为吻合的。

尽管一路遭到否定和质疑，但就在这本《新疆和田玉开采史》发布时，卢兆荫先生给出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目前在玉器研究领域还没有一个人能像于明这样积累如此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也是全面系统梳理玉文化文献史料的第一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研处处长、研究员刘国祥直言，这是目前国内和田玉原创研究的最高水准。

和田玉进中原最大功臣

《新疆和田玉开采史》最初只是源于于明的一个解不开的疑问，但随着一个问题的答案显现，下一个问题便又冒了出来。这就又涉及本书提出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创观点，汉代中期以后，新疆和田玉真正进入中原的时间节点在哪里？这到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还是由于某一突发事件？

2015 年江西南昌海昏侯墓的发掘是当年考古界的一件大事，墓葬出土的文物极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发现了籽料半成品，这是至今为止出土玉器和和田籽料的最早原生态。于明说，这一时期（公元前 74 年）玉料来源是多样化的，既有和田的，也有其他地区的。这也意味着，这一时期应该是玉料来源的转换期。而到了稍晚的陕西西汉元帝渭陵，玉器已经基本全部来自和田。

再往前推，于明一直对一个地方耿耿于怀，它就是“玉门关”。玉门关是当年汉朝中央政府在西域与中原的道路节点上设立的关卡。根据

于明：学术争论是我想要的

于明的耿直、任性“冒犯”了很多同行，甚至在这么多年野外考察的路上，让陪同他的人叫苦不迭。

新疆和田玉行业协会秘书长杨翔宇自认是团队的兼职司机、向导，外加“保姆”。在他的记忆里，于明有一个口头禅“无论如何”，而他做事最大的特点是没有计划性，“只要决定了的事，可以不顾后果和安全”。

过去，昆仑山上没有车路，想要到达一个玉矿，直线距离 5 公里的路，就得走上 12 个小时，那可是海拔 4000 多米的山路。即便现在通了车，

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陈梦家先生的考据，玉门关的设立时间应该在公元前 110~ 公元前 108 年。而这一时期正是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后，中原与西域开始进行贸易的时刻。

于明大胆假设，新疆和田玉进入中原就是因为张骞出使西域这个独立事件的发生。在此之前，中原没有新疆和田玉。

这个观点再次招致学界的一片争论。《新疆和田玉开采史》正式出版前，于明把书稿给了七八位业内人士提前审阅，其中有四五位专家都以为，这样的说法过于武断，没人能百分之百排除张骞出使西域前，有新疆和田玉少量、逐步地传入中原。

“至少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在这之前的出土玉器证据。”于明始终坚持在这个问题上不留余地，除了这个原因，还有一方面是源于他对玉文化的个人理解。

“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就算有零星的和田玉输入，也不是两个政权之间有组织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互通。”于明认为，西域游牧民族本身不存在玉文化基因，偶然的交换或者流转不能等同于一种文化现象。

况且，他特别强调，新疆和田玉什么时候进入中原还涉及学术界的一个原则性问题，不该含糊其辞。

近几年来，和丝绸之路一同提起的还有一个叫作“玉石之路”的说法。它的主要观点就是，默认商代以来新疆和田玉已经成为中原出土玉器的玉料来源，因此提出，在张骞打通丝绸之路以前，就已经存在西域与中原玉石贸易的路线。那么，丝绸之路不过是在古代“玉石之路”上拓展出来的。

过去在无法质疑这个观点的大前提时，于明也认为这样的说法不无道理。可一旦明确了新疆和田玉真正进入中原的时间，“玉石之路”的说法也就彻底站不住脚了。

道路条件依然很恶劣，随时可能遭遇危险。

但是，于明坚持用脚做学问，爬上每一座玉矿，亲手采集原料。“除此之外，就算是矿主带来不给，我都不信。”他认为，只有这样采样才可能确切、真实。

这是追求真理，还历史一个真面目的应有态度。“因为这个目的，我必须说真话，不打马马虎眼。”

面对各种争议，于明始终乐于接受。“学术争论是我想要的。我不怕被攻击，怕的是避免交锋的态度。”

经历的勾勒和两百余件不同时期代表性作品的展示，呈现这位陶艺家的一生。

2018 年是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共产党宣言》发表 170 周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特邀请国内知名马克思主义大家撰写“走近马克思”小丛书，包括孙正聿的《马克思与我们》、陈先达的《马克思与信仰》、陈学明的《马克思与当代中国》、顾海良的《马克思与世界》，旨在让更多的读者走近马克思，了解马克思，熟悉马克思。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今年推出的重磅书，还有《梁启超全集》，10 卷本的《戴逸文集》正在编辑当中，2 月将出版其中几本。

《《荒岛》及其他文本：文本与访谈（1953—1974）》是南京大学出版社“当代激进思想家译丛”系列的最新一本。

吉尔·德勒兹是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他被视为左翼尼采主义者，被看作后马克思主义潮的一分子。本书辑录了德勒兹从 1953 年到 1974 年发表的几乎全部文本，并严格地按照文本发表的时间顺序来编排。编者大卫·拉普雅德是德勒兹的学生，他表示，“这本文集旨在使我们便于阅读那些经常难以获得的德勒兹的文本”。因此，这本书是德勒兹研究者的极佳一手资料，也是研究法国哲学、后现代主义的有价值的文献资料。

村上春树新作《刺杀骑士团长》无疑是开年国内出版界最值得关注的作品。简体中译本即将于 2 月预售，3 月纸质电同步上市。此外，上海译文出版社还将陆续出齐 2017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的作品，包括他最重要的三部长篇《长日将尽》《我辈孤雏》《莫失莫忘》的全新译本。

近年来“译文纪实”书系已形成一定规模，并受到关注。今年，这套书将有《创水记》《长乐路》《寡头》《故宫物语》《鱼翅与花椒》《老后破产》等涉及社会方方面面现实话题的纪实作品推出。（喜平）

打造工业技术科普新模式

『中国制造 2025 大众读本』丛书

1 月 11 日，在 2018 年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举办了“中国制造 2025 大众读本”丛书推介活动。

“中国制造 2025 大众读本”丛书由九三学社中央科普工作委员会和科技工作委员会组织编写，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即将出版。丛书共分十册，总论《中国制造 2025 曙光：智能·绿色·融合·创新》全面剖析了我国制造业的新阶段、新形势和新环境以及面临的挑战和任务。其余九册则分别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农机装备、新材料等重点领域进行科普解读。

“‘中国制造 2025 大众读本’丛书从 2015 年 7 月开始策划，是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重点选题，也是我社重点图书之一。从策划到今年 2 月底正式出版，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在活动现场，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业务总监、副社长白宗文介绍说，“之所以用这么长时间来打磨这套书，而不是匆匆忙忙出版‘蹭政策热点’，就是为了做出一套精品。”

丛书总主编、中科院院士褚君浩因故未能来到现场，但他特别为本次活动录制了两段视频。在视频中，褚君浩阐释了这套丛书的目的就是在于，通过科学普及，让大众都能消化吸收和运用扩展“中国制造 2025”的科技内涵，从而能够在实现创新型国家建设中更好地发挥才智。

近几年，我国科学传播工作取得了明显进步，但其中科学知识的普及与传播居多，侧重全民科学知识的积累。“为了提高全民科学素养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褚君浩表示，“但与此同时，如何进一步传播从知识到技术的转化，以促进产业和经济发展，是需要广大科技工作者尤其是致力于科学普及及创作的科技工作者深入思考并身体力行的。”

在褚君浩看来，“中国制造 2025 大众读本”丛书从国家政策层面的顶层设计、产业的发展轨迹和知识内涵等方面，对我国制造强国国家战略的阶段性纲领“中国制造 2025”进行了多方位、全视角、普及化的解读，是对工业技术科普读物内涵的又一次深入发掘，标志着我国原创科普图书创作的一种新模式、新品种、新门类的诞生，“将为广大科普爱好者奉上全新的知识盛宴”。（张文静）

“千书工程”结硕果

1 月 11 日，在 2018 年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世界图书出版公司（以下简称“世图”）举办了一场名为“‘千书工程’结硕果，‘科学经典’再出发”的科学家访谈会，中科院院士夏建白、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曹则贤和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研究员苗长兴与观众分享了他们与“千书工程”相遇相知的故事。

“千书工程”是世图在 2002 年制定的科技图书出版战略。当时，因为出版外文影印图书利润低，多数出版社都不看好这类出版项目，但为了解决我国科学研究和教学资料匮乏的实际困难，世图还是坚持开展引进科技图书的出版业务。如今 15 年过去了，“千书工程”已经出版外文影印专业图书 2000 多种，内容涉及数学、物理、力学、化学、金融、经济等十几门学科。其中，施普林格“数学研究生教材”（GTM）等经典教材和专著被国内高校广泛使用。

夏建白肯定了“千书工程”对几代科学工作者的积极影响。曹则贤则介绍了自己与这个图书工程的独特缘分。26 年前，他初读到了工程中的 Peter J. Olver 的经典专著《李群在微分方程中的应用》，这本书对自己产生了重要的帮助，直到现在它依然是自己不时查阅的案头书。对于苗长兴而言，“千书工程”不仅影响到了自己，还使他的学生获益良多。到现在他还清楚地记得，每周末用这个工程中的专业书对学生进行“魔鬼训练”的场景，如今他的学生已经成长为优秀的年轻科学家，在世界知名高校中承担研究工作。老中青三代科学家的亲身经历，成为“千书工程”促进科学研究进步的生动见证。

世图党委书记汪武表示，今后将继续贯彻“服务科研，服务高校”的出版宗旨，在“千书工程”的基础上，今年启动“科学经典”出版工程，在中国出版集团的支持下，扩大引进科技原版图书，并择优翻译出版，为进一步推动我国科学研究的深入和高等教育的提升作出努力。（张文静）